

古代诗词典藏本

袁行霈题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诗
经
选

李山◆撰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古代诗词典藏本

袁行霈题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诗经选

李山◆撰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5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经选/李山撰.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5

(古代诗词典藏本)

ISBN 978-7-100-11462-2

I.①诗… II.①李… III.①古体诗—诗集—中
国—春秋时代②《诗经》—注释 IV.①I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60380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诗 经 选

(古代诗词典藏本)

李 山 撰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

ISBN 978-7-100-11462-2

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开本 880×1240 1/32

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张 14

定价: 42.00 元

古代诗词典藏本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编 委 (按姓氏音序排列)

曹 旭 陈祖美 程章灿 过常宝 蒋 寅

刘 石 刘扬忠 莫砺锋 钱志熙 王兆鹏

钟振振 周洪波 左东岭

策 划 厚艳芬

走出学术象牙塔

刘跃进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相比较而言，我们在普及工作方面做得还很不够。尽管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，但精品甚少。很多学者不屑于做普及工作，认为体现不出研究水平；即便有水平的人去做，也很难得到同行认可。这样一种偏见，必须改变。

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，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，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。汉代对于经典的注释、唐代对于古注的疏证以及清代乾嘉诸老对于历代经典的重新阐释，其出发点多是普及经典知识。现代学术研究又何尝不该如此？即以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，六十多年前刚刚筹划建立文学所的时候，最初的工作主要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。近来翻阅《王伯祥日记》，里面详细记载了郑振铎、何其芳等人如何精心策划《诗经选》《史记选》《汉魏六朝诗选》《三曹诗选》《唐诗选》《宋诗选注》的工作，印象深刻。每一部书的编纂，从篇目的确定，到注释的推敲，都经过反复打磨。然后内部油印，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、高等院校，广泛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。经过这样几个回合，才最后定稿，公开出版。这样的书，阐释经典，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，多数印行在数

十万册以上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。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，也逐渐走出学术圈，为广大读者所熟知。前辈学者的工作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。

启示之一，我们必须对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有一种正确的认识。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，说易行难。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明确指出：“人民要求普及，跟着也就要求提高，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。在这里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，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。而这种提高，不是从空中提高，不是关门提高，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。这种提高，为普及所决定，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。”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，首先就是要做好普及工作。没有普及，何来提高？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普及。现在，不少学者宁愿躲进象牙塔中做专精研究，也不愿意做点文化普及工作。这种观念值得商榷。毫无疑问，专精研究当然应当鼓励，给予尊重，这个社会也确实需要一批很专精的研究者，去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，尽管这种研究可能对社会现实没有直接作用，但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。这道理不言自明。但同时，我们更需要一批人出来宣讲传统文化，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大众所认知。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，学术研究的本质也要求必须关注社会、依靠群众。如果我们的学术脱离人民群众，那就成了无根之木，难免凋零枯索的命运。这道理不言而喻。

启示之二，做好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，首先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。康德《逻辑学讲义·导论》说过：“学术的讲述是通俗讲述的基础。因为只有能够彻底讲述某物的

人，才能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它。”这段话把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讲得非常明白。提高在前，普及在后。普及不是随意发挥，一定是在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才有价值。真正的普及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好的普及工作者，必须是在他这个领域掌握了丰富知识的研究者。没有深入的研究，哪来生动的普及？王伯祥、余冠英、钱锺书等人的学术普及工作就是成功的典范。对学者而言，深入易，浅出难。浅出所以难，是对作者要求高，他必须真正读懂经典作品，才不至于把经念歪。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，专注于某一学术领域，遇到不懂的地方，偷懒的办法就是绕过去，而要讲给大众听，就无法藏拙。因此，做好普及工作，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积学储宝、研阅穷照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普及工作才会更有实效，也才会更有意义。

启示之三，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，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，更是传递一种理念，一种理想，甚至还可以说，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。大家都认同这样的观点，即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。一个不知本来的民族，是绝对没有未来的希望的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显得尤为重要。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，物质文化可以全球化，而精神文化却有其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文学研究工作者，有必要深入总结我们民族的传统特性和现实追求，并把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为人民大众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梦想。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，将会永久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由上述几点启示来看，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这套“古

代诗词典藏本”，恰逢其时，其意义自不必多说。编者的态度是认真的，他们以“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”为追求，其选家皆术有专攻，在其所选评方面具有相当的专精研究与学术影响，从而保证了选本的专业性与权威性。

正是由于每位选注者的研究领域、研究特点不同，因此“古代诗词典藏本”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强求整套丛书风格整齐划一，而允许一选本有一选本之个性特色。这里仅举数例：李山教授的《诗经选》，仿佛带领读者做了一次重回“诗经世界”的新旅——重新审读其字句、篇章，重新考订其创作年代，勾勒其礼乐背景，体味其文化意蕴，欣赏其风雅艺术，考察其歌唱方式……《王维诗选》的作者王志清教授认为，王维诗乃诗之哲学，亦可谓哲学之诗。故其选评，敏于感悟，精于赏玩；其评赏文字，巧于切入，工于辞采。《李清照诗词选》的作者陈祖美先生，在历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更贴近窥见了李清照的种种内心隐秘，从而细绎出易安的十余种“心事”——幼年失恃、党争株连、婕妤之叹，以及终生无嗣的庄姜之悲等等，提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独到见解。

无须赘言，只这几本书的简略介绍，即已充分显示出选注者的学术个性。在大的统一的原则下，保留各个选本自己独特的面孔，这一点，近于文学所编写经典读本的传统。钱锺书先生的《宋诗选注》，就特别强调自己“注”的特色，而与其他选本略有不同。希望这种不拘一格、力避匠气的文风与学风，贯彻丛书始终，从而涌现出更多的既拥有学术品位又文采斐然，既不乏前沿理论、自出己见又深入浅出的精

品选本。

丛书付梓在即，编者希望我就上述特色发表感想，以便让更多的读者理解，这种信任让我感动。确实，好书好序，相得益彰。如果翻开一部新书，上来就是一篇乏味的序言，就好像刚出门，便遇上障碍物，诚可谓“出门即有碍，谁谓天地宽”，叫人眉蹙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早就告诫：“凡书有所发明，序可也；无所发明，但纪成书之岁可也。人之患在好为人序。”贸然作序，对读者可能会是一种冒犯。但我想，好书确实需要介绍，好意也要有所表达。我真诚地呼吁我们的同行，在努力攀登学术高峰的同时，不要忘记为社会尽些心力，为国家文化建设奉献我们的绵薄之力。

六十年前，文学研究所推出的经典读本，以著者自己研究为基础，广泛借鉴吸收前人成果，取得空前成就，影响至今。我们相信，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这套“古代诗词典藏本”，也一定能在学术普及工作方面推陈出新，为广大读者所认可。

2014年5月30日

草于京城爱吾庐

导 言

《诗经》^①三百篇，是文学的经典，也是文化的经典。

何谓经典？表现了民族精神并参与了后续民族精神塑造的作品就是经典。《诗经》，无疑是这样的经典。因为《诗经》时代正是民族文化创生的关键期，三百篇表现了这个关键期精神生活的各方面；而在《诗经》诞生后的两千多年里，它曾在经学的阐释下参与过古代精神生活的建构，也曾在理学的阐释下参与古代民族精神生活的建构。今天，它也应该在新学术的阐释下，重新参与到民族精神的延续与更新中来。

一

说到《诗经》，最常见的定义是“《诗经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”，有人不满“总集”两字，将其改为“选集”，可最终还是“集”。不论是“选”是“总”，只要

① “诗经”这个称谓出现很晚，最早的称谓是“诗”或“诗三百”。战国晚期已经用“经”来称呼《诗》《书》《周易》等书了，但“诗经”一词出现，则始见于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“申公独以‘诗经’为训以教”语。此后，到南宋时人廖刚《诗经讲义》，才有了以“诗经”为书名的称法（参屈万里《诗经诠释》、余培林《诗经正诂》两书之序）。

是“集”，给人的印象就是：这是一本“诗歌”的“书”。这样的理解并不算错，但就是把《诗经》的“原生态”给抹掉了。

所谓《诗经》的“原生态”，是指诗篇创制之初的情形。就《诗经》而言，最初的制作是用来在典礼或其他场合歌唱的。《诗经》篇章最初与接受者见面，是经由演唱而达致的。这里所谓的“歌唱”，不一定都是一般意义上的配乐歌咏，如《史记》所谓的“皆弦歌之”。“弦歌”而唱的诗篇是有的，但是，还有一些篇章，特别是雅颂篇章，多是严肃典礼上与《诗》相关的“声响”，或唱、或吟、或诵读，在那样的场合，都算是“歌唱”。在所有神圣的礼仪场合中，人们总是用最庄严的包括言辞在内的各种方式，来表达虔诚敬爱之意。具体到这些言辞的表达，是用歌唱、吟咏还是诵读，那则要看神圣场合的具体需要了。还有，在这里所谓的“歌唱”，也不是要重提那个“《诗经》不入乐”的老问题，而是强调，《诗经》的篇章在当初是与西周“礼乐文明”的建构不可分的，换言之，礼乐文明的建构就含着诗篇的创制。举例而言，西周大力倡导农耕，如此的政治意图，在西周王朝不是靠政令宣教，而是靠隆重的亲耕典礼来实现的。春耕到来之际，周王要择日率百官僚属前往王室直属的籍田之上，操起农具表演性地耕种一番。这就是所谓的籍田大典。隆重的典礼是有热烈的舞乐歌唱节目的。所歌之诗，就是《诗经·周颂》的《噫嘻》篇。整个的亲耕大典，有仪式，有歌唱，还有周王亲耕“表演”，实际就是一出鼓舞精神的大戏。这就是礼乐文明

特有的“表现”形态。歌唱诗篇的作用是宣示典礼的意义。隆重的亲耕典礼，若没有这首诗的歌唱，典礼的意义就难以宣明。此例说明，诗篇在礼乐中的地位和价值是多么重要。强调《诗》的礼乐文明属性，还关乎诗篇的理解。如本书所选的《周南·卷耳》，像阅读后来的文人诗那样读之，怎么读都扞格不畅，因为篇中“采卷耳”是女子之事，而“酌金罍”以及骑马、登高，却是男子的行为；就是说，一篇之内竟含有两个“我”，即两个抒情主体。但是，若将其理解为仪式中的歌唱，是男女对唱，全篇就豁然可解了。这样的例子在《诗经》中颇有一些。

二

《诗经》篇章，特别是雅颂，既然与西周礼乐文明建构相关，那么，诗篇创作就与礼乐文明建构的历史过程相一致。在古代，学者多以为周初的周公“制礼作乐”，是诗篇创作的高潮，于是很多《雅》《颂》篇章就这样被当作了周初作品。同时，历来都承认的另一个创作高潮，是西周末年“风衰俗怨”时“变风变雅”的涌现。这是《雅》《颂》创作两期说。时至今日，还有一些学者以为《诗经》作品《周颂》最早，其次《大雅》，其次《小雅》，之后为《国风》。其实是受古代说法影响下的误解。近年来，中外学者通过对出土青铜器及铜器铭文的研究，得出大致相近的结论：在西周中期亦即周穆王、恭王这段时期（可能延伸到此后的懿王、孝王时期），曾发生过礼乐创制的高潮，

也有学者称之为“礼制革命”。这与笔者多年来考察雅颂创作时代所得看法相吻合。西周穆王、恭王两朝，约六七十年间，实际也存在着一个雅颂诗篇的创制高峰，且与礼制更新息息相关。这一时期，王朝大祭先王，具体说，较早时曾大祭文王，并旁及太王、王季及武王等；稍晚若干年，又有周人对自己始祖后稷的大祭，并兼及公刘等。与此相伴，是《周颂》颂赞文王、太王、后稷德行诗篇的相继问世，至于《大雅》新篇章的出现就更多。这些，一般而言都是祭神典礼中的诗歌。还有一些诗篇的创作，则属于新现象，它们颂扬典礼活动中的周王，或者是向出游的周王献诗。后者，虽不免阿谀奉承，但是，与前者一样，都显示着诗篇创作的重大变化：人们开始把诗篇的歌唱，献给活在世上的人。仅就这一点而言，那些献给周王的诗篇也是有其历史价值的。

那么，隆重祭祀祖先的意义何在？一言以蔽：发掘传统中的精神资源，以应对生活中面临的困境与问题。以此，诗篇创作实际表现的是一种“化传统为己有”的精神努力。周家建国百年了，诗篇高扬“文王之德”，其作用即在精神上凝聚那些业已出现“封靡于尔邦”（《周颂·烈文》）倾向的大小诸侯们^①。稍后的大祭后稷、公刘，则与西周中期恢复农桑稼穡生产有关；同时，大彰后稷功德，还与当时

① 周初封建诸侯，文王后裔明显多于武王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：“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，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。管、蔡、郕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聃、郛、雍、曹、滕、毕、原、酆、郕，文之昭也。邰、晋、应、韩，武之穆也。”文王之子得封较武王之子竟有四倍之多。

历史的建构——即把周人早期历史与尧舜禹的神圣谱系连接起来——的精神动向有关。再从大背景上说，当时礼乐创制的高涨，又是人群融合的积极结果。自周初起，周王朝就对殷遗民实施宽大政策，到西周中期，政策实施已有百年时光，所获得的历史效果，就是殷商遗民敌对情绪的消除，及殷周两大人群之间关系的融合。中期铭文对此多有显示，而《周颂·有瞽》《有客》《振鹭》及《大雅·文王》诸篇表明，来自殷商人群的艺术家是参与了宗周礼乐建构的。也因如此，西周中期称得上是一个古典文明缔造的特殊时代。

当然，西周早期数十年，还是有诗篇的创作的，如周初“大武乐章”中的几首，以及《般》《酌》《时迈》等都是，只不过数量上远不如古人想象得那样多而已。此外，在中期诗篇创作高潮之后，西周晚期也确实有一个新的高潮期，只不过，现代研究表明，这个高潮期延续的时间不仅限厉王、幽王两朝，《小雅》中颇有一些篇章是东迁后周平王时期的作品。这一点从宋元开始，就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了。

三

十五国风，也是礼乐文明的一部分，不过情况较为复杂。风诗中，如《周南》《召南》和《豳风》，是周王朝的“乡乐”（见《仪礼·燕礼》），是王室的歌乐及来自王畿地

区的诗篇。此外更多的诗篇，则来自各诸侯之邦，如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等十二国风。其分布地域也难免重叠，如《王风》地域就与《周南》部分叠合，又如《秦风》来自秦地，而此地的大部分即西周时的宗周之地。大体而言，风诗出现的高潮期从西周崩溃前夕开始，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。这又与当时历史文化重心由西周王室向东方诸侯转移的大势相应。不过，具体说来，风诗高涨的原因颇复杂。

《诗经》有“风”，笔者以为，与西周天命观有关：王朝的兴替，决定大权在上天。而上天决定把大权交给谁，按古人理解，又取决于小民的态度。小民的呼声上天听得到，这就是所谓“天听自我民听”（《孟子》所引古本《尚书》句）。这样的观念是西周取代殷商之后出现的。那么，采集小民的歌唱，既可了解民声民心，也可藉此窥测上天意图。小民有悲苦的呼告，古人理解，上天听了以后会有反应的，也会传达给世人的。甲骨文显示，早在商代人们就认为，上天的意图是由“风”来传达的^①。这样的神秘观念周人接受了，成为西周天命观的组成部分。有如此的观念，就会有相应的设施。笔者以为，各种文献记载的“王官采诗”说，在这样的逻辑下是可信的。过去，因记载“王官采诗”的文献主要为东汉典籍，所以近代以来的学者疑信参半。近年战国楚简《孔子诗论》出现，其中有“举

^① 参郭沫若《卜辞通纂》关于甲骨文“风”“风”的解说。“风”背后有神意，也见于甲骨文及《山海经》等文献，历来学者对此多有讨论。又，赵诚《甲骨文简明词典》说：“商人认为风听从上帝的指挥，如‘帝其令风’（合一九五），则风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有意志的自然现象。”（中华书局1988年版，第188页）

贱民”“大敛财”云云，学者研究，所言指的就是“王官采诗”之事。这大大增加了“王官采诗”说的可信度。不过，笔者以为，要确定十五国风中一些篇章是不是“采诗”的结果，最终还是要由作品自身的证据来确认。也就是说，若风诗真的为王官采集所得，必然会在作品层面留下痕迹。仔细观察，这样的痕迹有，而且不少。例如，“十五国”所占地域那样辽阔，然而各地风诗的语言、句式及韵律却是高度统一，这是可以由“王官采诗”来解释的^①。这样的例子还有其他一些，本书各诗注解对此有说明。此外，对“采诗”也应妥善理解。有时候社会上有现成的歌谣可采，然而更多的时候，民间只有感人故事的素材，如一些弃妇的不幸遭遇等。所谓“采诗”，其实是对这些故事进行初步加工，之后层层上交，最后到达当时的音乐专家即太师之手，由这些乐官进行“比其因律”的精加工。就是说，一首所谓“民歌”，是经过多道加工手续才完成。将

① 近年有受西方“口头史诗”研究影响的海外学者，用“套语”理论研究《诗经》中的一些句式类似的语言现象，以为这些是抒情歌手的套语。应该说，这样的新思路，确实可以解释一些语言现象，但是，采用这一来自西方的思路之前，应该先要证明这样一点，即在上古时代中国那样辽阔的地域上，是否已到处都有口头的抒情歌手，而且，更重要的还需要证明，当时辽阔地域上到处都使用同一种方言。没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存在的证明，率然采用来自西方口头史诗歌唱方式解释《诗经》的一些篇章，就未免贸然之嫌。就中国古代情况而言，有文献记载，春秋战国时期，楚国人是不能听懂越人歌唱的。楚越相邻，尚且如此，其他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方言既异，“套语”又何从谈起？但是，采诗官的存在，倒可以解释《诗经》语言上的近似现象。因为，王官作为固定的职业群体，可以用当时通行的“雅言”（“雅言”出《论语》，春秋时已经存在）记录各地方言的歌唱，因而《诗经》中出现一些语句上的雷同，也是很可理解的。

民间的故事采集加工成为反映社会问题的诗篇，如此的制作，不是很像今天的“报告文学”吗？

不过，对古老的“王官采诗”说，在理解上还需要做些调整。其一，采诗的高潮在西周后期。这一点不明确就会对“采诗”说有误解。西周早期也有采诗，但很少。从西周后期起采诗趋于频繁有其特定原因，具体说，就是王朝内部贵族阶层与王权势力之间的权利争斗。史载周厉王“专利”，所谓“专利”，就是将一些原属公共所有的资源，如山林沼泽之利划归王室所专有。实际上，这可以理解为王室为财政所迫不得已的措施。西周封建制，是王朝对有功贵族的不断赐封；资源有限，其结果必然是王室权利的日益减缩。厉王“专利”，受伤害最大的当然是一般小民，不过，对两百年封建养成的贵族阶层也不会有利。这使得贵族一时间有目的地站在了小民一边，利用小民情绪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采诗，亦即收集小民的呼声以对抗周王，或许就是贵族可以使用的办法。这是有迹象的。恰是在对厉王“弥谤”的反对中，召穆公这位出身老权贵之家的大人物站了出来，强调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”的危险性，又强调“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瞽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”的重要。而且，《诗经》及相关文献显示，召穆公及芮良夫、卫武公等西周后期大人物，还是一些《大雅》篇章的作者。那么，由他们来策动采诗，使之形成一股潮流是很有可能。

其二，过去以为“风”诗只见于“十五国”，实际上，